

· 中国名作家性恋小说精选书系 · 刘勇 彭斌柏 / 主编

KA ER
MEI LUO
GU NIANG

郭沫若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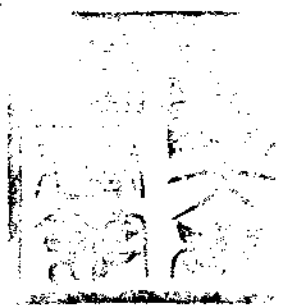
喀尔美梦姑娘



中国名作家性恋小说精选书系

喀尔美萝姑娘

刘 勇、彭斌柏 主编
郭沫若 著



1001198/06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160 号

责任编辑：马朝阳

封面设计：童行侃

责任校对：李 蕊

责任印制：蒋福彬

中国名作家性恋小说精选书系

喀尔美萝姑娘

刘 勇 彭斌柏 主 编

郭沫若 著

*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全 国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保定满城文斋印刷厂激光照排

保定满城文斋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5.875 字数：135 千

1993 年 10 月第 1 版 199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100

ISBN7-303-02992-3/I·311 定价：4.40 元

总序：美丽与邪恶的较量

不必讳言，性恋小说，究其实质是以描写主人公的性意识为主的小说，这就不可避免地凸现了其对男女关系及性经验的反映和表现。而且同样明确的是，尽管性恋小说与爱情小说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但它们之间的区别也是十分清楚的。如果说爱情小说一般是着力表现现实中的人在男女关系上的核心冲突即灵与肉的搏斗，那么性恋小说则分明把表现的重点放在了肉的一面。因此，这样的小说往往蒙受着文化、道德、社会、审美等多方面的巨大压力，它的问世之日，往往便是其受责之时。

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事实上，性恋小说所引起的反响不仅总是异常强烈，而且总是非常复杂的。《金瓶梅》所遭受的正反两方面的褒贬，使人简直难以剥离它的价值和它的糟粕；郁达夫的一篇短短的《沉沦》竟然在现代文学史上掀起那样大的波澜，群起攻击者有之，挺胸辩解者有之，更有一群连夜赶往上海购买作品并极力仿效作品主人公衣食住行的纯情热血青年！当然人们也不会淡忘刚刚过去不久的当代文坛上的所谓“性文学热”，读者既从张贤亮的“唯物主义启示录”以及莫言、王安忆等人的作品中领悟到性描写所触及到的人性的深处，同时又为某些“越轨”的描写而深感不安和忧虑。对于性恋小说而言，责难和诱惑始终伴随着它。的确，这是一个美丽而充满沼泽的敏感区域，而且它并非中国所特有，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它是那样古老，从《诗经》便开始有了这样的论争；但它又是那样年轻，乃至当今世界任何涉足这一领域的作家，都很少逃脱同时享受赞许和鞭撻几项桂冠的殊荣。无论问题如何复杂，有一点是简明的：性恋小说总是拥有为数不少的读者。这个简单的事实足以使我们应该严肃认真地审视这个问题。不过，问题的实质显然不应该是性恋小说所招致的反应如何，而首先

应该是它自身所具有的本质内涵是什么。

性，可以说是人与生俱来的本能，不管文化、伦理、道德及人类重大的命运较量（如战争、政治运动）都曾几何时想把它逼到一个死角，但它都会以一种不可遏制的激情从一个正常人的身上喷然而出。东西方古老的文学故事早就饶有趣味而又令人深思地说明了这一点。《十日谈》中有一个故事，讲一个从小与世隔绝的年轻人第一次随父进城，盯住一群正在戏水的女人，不解地问道是什么东西，父亲吓唬他说，那是“绿鹅，都是祸水”，不料年轻人恳求道：“父亲，让我带一只绿鹅回去吧！”而《子不语》中也有如出一辙的故事：一自幼从师在深山修行的小沙弥，十多年后首次随师父下山，遇一女子，小沙弥惊问此为何物，师父正言厉色地告之“此名老虎。人近之者，必遭咬死，尸骨无存。”回山后，师父问及小沙弥此行所感，没想到小沙弥悲伤地说：“一切东西我都不想，只想那吃人的老虎，心上总觉舍他不得。”即使是祸水，老虎，人也难舍，也是天性使然，所以孟夫子断言：食、色、性也！性意识及其体验，是人生诸多体验及意识之中极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它不仅仅是一种理性上的纸上谈兵，更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现实世界中的具体感受；它不仅仅是人们一时的饥渴，而是将伴随一个人的一生的生命运动。霍理士就曾说过：性是一个通体的现象，我们说一个人浑身是性，也不为过；一个人的性的素质是融贯他全部素质的一部分，分不开的。正是因为这种大自然神秘的恩赐，人类才得以继续繁衍下来，才能长久地作为万物的灵长而君临一切。因而，性本来就是伟大的、美好的、值得讴歌的。但是，从西方到东方由于宗教神学的禁欲和长期传统封建伦理文化的压抑，加上“人是文化的产物”这种理性观念的巨大威力，这个本来是很自然的、很透明、很高尚的性反而被弄得很不自然、很神秘，甚至很卑下了。性是伟大爱情的基础，没有性，爱情只会变成苍白的梦呓！我们难忘十四岁的普希金见到自己的意中人时那激情洋溢的心灵震颤：“一颗火热的心被征服了；/我承认，我也坠

入了情网!”我们更加能理解章永璘见到充满青春活力、美丽而袒露于水中的黄香久的肉体时对于性的苏醒和渴望!性,当然不是弗洛伊德所认为的是世界一切文化创造的原动力,但它确实是一个人为极为重要的生命体验。性的魅力往往是伟大而神奇的。我们在劳伦斯的作品中,当会看到性在男女关系中所带来的巨大的激情和创造力。人们惊异于作家用如椽的大笔描绘出的伟大而残酷的战争,设置出的奇妙的构思,刻画出的美妙的人物,同样,人们倾慕于那些文学巨匠们笔下所描绘出的男女关系中的性的魅力。应该承认,令人目眩的爱情只是对两性中“性”抽纯之后的结晶,没有性,爱情则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人们沉溺于罗密欧与朱丽叶纯洁无望的爱情,也被贾宝玉、林黛玉的爱情感动得热泪盈眶,而那首描写唐明皇爱情的《长恨歌》更是经久不衰,正是男女关系中性魅力的自然展现。在这里,性不是一种挑逗,而是一种男女关系经过长时期文化模塑后的默契。而对于人来说,性的伟大与崇高恰恰在于它决不单纯是原始生理欲望的冲动,它是与心理、智慧、情感、道德、伦理融为一体的,是紧紧伴随着责任感、审美感和社会效应的。从本质上讲,人的性本能是与人的社会性、时代性相联系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性爱从来都成为以展现、挖掘人的本质为己任的文学所描写的重要对象,诚如恩格斯早在19世纪80年代曾经指出过的那样:“性爱特别是在最近八百年间获得了这样的意义和地位,竟成了这个时期中一切诗歌必须环绕着的轴心了。”(《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性的意义对人生、对文学不仅仅是能量,是素材,从肉欲本能到感性认识再到艺术美学,这一升华过程本身就包含着性意识的不断扩展,因为“感觉不仅仅是、甚至主要不是认识器官,它们的认识功能与其欲求功能(肉欲)浑然一体,它们是满足爱欲的,受快乐原则支配的。”(赫伯特·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这就是说性意识不是被动的、原始的,它是伴随(有时是促进)着人的社会意识、审美意

识发展升腾的。因此它成为表现一个人的丰富性和复杂情感世界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正因为性在人身上有着不可忽视的地位,因此许多作家在展示人物命运时,都自觉不自觉地把它作为描写的重点,因为描写一个人的性体验、性意识以及对性的态度往往能达到别的方面难以达到的深度。鲁迅在表现封建卫道者的虚伪时,如果仅从人物一般的外在行动上来表现,虽也具有普遍性,但却不易达到鞭辟入里的地步,因而采用了对人物性意识的挖掘。四铭(《肥皂》)美其名曰是给妻子买肥皂,实则满足自己对白天所见母女乞丐的意淫,而高尔础上下课前后一系列内心焦虑,正是他内心性焦虑的表现,这样就直入他们的内心,撕下了他们道貌岸然的面纱。这种眼光才是入木三分的,它不仅体现了鲁迅对中国社会现实的一般认识,而且显示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发展的独到见解。不夸张地说,对中国人性心理的深刻描写,同样是鲁迅对现代文学的重要贡献,这也是鲁迅作品自身深度的标志之一。而我们之所以说贾宝玉是一个封建社会的逆子贰臣,也主要来源于他对女性采取的与上辈人不同的态度,也在于他身处美女如云中的价值选择与行动。而这些人,如果不用这种性的方面来表现,就很难让人体会出主人公各自的性格特征。郁达夫作品的价值不仅在于它率先勇敢地展示了性苦闷在当时青年(包括作者本人)身上普遍存在这样一个客观的基本事实,而且它从性的压抑、苦闷和觉醒这一侧面揭示了富有时代意义的本质特征。同样我们之所以说样板戏中的人物太假,正是他们抛弃了这些方面,主人公没有丈夫、没有妻子、没有七情六欲,这样一种机械、公式化的人,势必会把他们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躯体变成了一具传达特殊意义的干尸,因而人物便显得极不真实。唯其在作品中表现了主人公的性意识,当然不是那种泛性表现,因而人物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真实的人,同样作家也才是一个真实的作家。

同时应该看到，性爱在文学描写的进展过程中也是一个标志人性解放的重要尺度，性爱观念、性爱方式的发展变化及其在文学作品中的映现，都是时代进步、人类觉醒的标尺。恩格斯在阐述现代性爱的意义时说：“现代性爱，同纯粹的性欲，同古代的爱，是根本不同的。第一，它是以所爱者的互爱为前提的；……第二，性爱常常达到这样强烈和持久的程度，如果不能结合或彼此分离，对双方来说即使不是一个最大的不幸，也是一个大不幸；……最后，对于性交关系的评价，产生了一种新的道德标准，不仅要问：它是结婚的还是私通的，而且要问：是不是由于爱情，由于相互的爱而发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73页）从《十日谈》、《金瓶梅》到《儿子与情人》、《沉沦》、《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我们不仅从这些作品的性描写中看到了人类不断觉醒的进程，而且看到了作家们为探求人性本质、促发人性升华所做的不懈努力。

在古今中外文学史上，每当一些性恋作品问世，便会随之出现所谓的轰动效应。当然，人们对经典名著的倾慕和与之产生的共鸣是很好理解的，问题是有些性恋作品在思想与艺术方面往往都是很不平衡的，但它们仍然拥有为数不少的读者，有些性恋作品的销售量往往是其它作品望尘莫及的。因此，从读者的阅读反应和审美思考来看这些作品的产生，不仅很有意思，而且有时是必不可少的。这里，自然有鲁迅所说的那种读者，他们“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私生子。”（《而已集·小杂感》）然而问题并不如此简单，读者决非个个都是具有窥阴癖的心理变态者。但读者的兴趣和选择又决非可有可无的指针，他们的审美取向，无论如何在一定程度上显示着作品的实际价值。我们不认为读者决定一切，但我们相信读者的心理体验和生活感受是紧连着作品的实际效应的。在这一点上讲，读者数量是重要的。但更为重要的是，对作品的理解，从根本上讲是读者对自己的理解，同时也是时代和社会对自己的理解。我们清楚地看到，中国传统的封建文化对于性意识的长期禁

枷，不仅加剧了人们对性的好奇心和神秘感，而且形成了人们的一种潜在的逆反心态。尤其是千百年来那些层出不穷的虚伪的道德规范和伦理说教，更强化了人们的变态心理。而“五四”以来的新思潮，有力地冲击了传统文化的禁锢，使人们得以从反封建的时代要求出发，表现出对人性及人生重新认识的哲学思考。人格独立、个性解放，包括对性意识的极力张扬，不仅是一种历史潮动，而且成为一种新的广泛的文化心态。因此，人们对性意识的觉醒和追寻，与郭沫若、郁达夫、穆时英等人的性恋小说契合了，甚至对张资平等人缺乏美感与思想深度的性恋小说，也接受了（张资平1926年出版的性恋小说《飞絮》一书竟行销数十版）。关键是人们在这些性恋小说中看到了历史，看到了现实，也看到了他们自己。与其说人们对这些性恋小说有兴趣，不如说人们对自己的命运和要求感兴趣！这恐怕也是性恋小说每每得以产生轰动的一个重要的社会历史内涵。

性爱小说有着极其复杂的状况，它是美丽与邪恶的交相结合。在性爱小说中，人们既能感觉到性爱的伟大、创造与魅力，也让人们看到它的压抑、畏缩甚至煎熬；它有着如《西厢记》中那样纯洁而美丽的丰富意象，但也不免有《金瓶梅》那样对性行为的露骨描写。它的美丽使人向往，然而它的邪恶往往令人退避三舍，同时人们还会因为它的邪恶而不去正视它的美丽，在给孩子泼洗澡水时，连小孩也一齐泼掉。这里确实有一个度和作家创作态度的问题，往往失之毫厘，谬以千里，精华与糟粕往往也在这里产生了分野。

主编 1993 年初春于北京师大

选编者序

郭沫若(1893—1978)曾经说过天才的发展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直线型的发展，一种是球形的发展。直线型的发展是以它一种特殊的天才为原点，深益求深，精益求精，向着一个方向渐渐展延，展延到它可以展延的地方为止……球形的发展是将它所具有的一切的天才，同时向四方八面的立体地发展开去。”毫无疑问，郭沫若自己就是一个球形发展的天才。他在文学领域的开创性贡献，不仅体现在新诗和历史剧之中，而且同时也在小说、散文、文艺理论等多种文学形式方面驰骋着自己的才华，发挥着自己的创造力。相对其成就辉煌的新诗和戏剧而言，他的小说创作是显得逊色一些的，早在30年代初期沈从文就曾尖刻地批评过郭沫若的小说是一个“不可救药的损失”。读郭沫若的小说“在文字上我们得不到什么东西”。沈从文甚至断言郭沫若在“小说方面他应当放弃了他那地位，因为那不是他发展天才的处所。一株棕树是不会有在寒带地方发育长大的”。（《论郭沫若》）确实，郭沫若的小说或许是在“文字上”不能使人得到什么东西，在客观细致的描写方面也或许像是沈从文所说的“处处是抽象蠢象”。但郭沫若涉足小说并不一定是要在这方面发展他的天才，而是他的天才要让他在这方面显示一下他的创造，是他那特有的情感气质要在小说这一载体中得到一种独特的发泄。显然，郭沫若小说创作的实际价值并不在于其本身的长短优劣，而在于他是怎样写小说的，在于他的小说是如何从一个新颖的角度来传达一个诗人的情感世界和哲学思考的。

郭沫若的小说创作从“五四”初期的《牧羊哀话》到40年代后期的《地下的笑声》，在2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从独抒情怀到取材历史再转向现实写真这样几个明显的变化阶段。抒情小说多集中在早期，其中包括了记录作者自身生活经历，绝少虚构成份的

“身边小说”如《落叶》、《牧羊哀话》、《喀尔美萝姑娘》、《叶罗提之墓》、《残春》以及长篇自传体小说《漂流三部曲》等。历史题材的小说多创作于30年代中期，集中收在1936年出版的历史小说集《豕蹄》里。这些作品融合了浪漫主义的夸张和现实主义的批判笔触，显示了一种勾连历史与现实的深邃目光。而40年代创作的《月光下》、《波》、《金刚坡下》和《地下的笑声》等现实题材的小说，则抨击时弊，倾吐愤懑，再次表现了郭沫若作品的力度和豪情。尽管郭沫若的小说创作亦呈现出多种风貌和一个全才的特征，但总观全貌，其早期以性爱为主要描写对象的抒情小说，无论在数量上、影响上，还是在独创意义上，都最能代表郭沫若小说创作的真正价值，并充分体现出郭沫若是一个最“爱写自己”的作家的本质特征。我们这里所选编的就是郭沫若这部分小说当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

二

郭沫若最早的小说创作，是一篇被退了稿的短篇《骷髅》。虽然作者亲手焚毁了这篇稿子而使之永远没能发表，但后来他在《创造十年》中为我们大致描述了这篇小说的情节。这是一个怪异变态的性爱悲剧：渔夫把溺死的情人的尸体搬到自己的船上，久久不忍抛弃直至尸体腐烂。一个盗尸、奸尸的荒诞奇异的梦幻故事，一个欲望被压抑扭曲了的灵魂，而且通篇都是由梦境和潜意识来构织的。这篇未曾发表的作品对郭沫若的抒情小说来说似乎具有某种特殊的规定性和指向性。实际上郭沫若后来正式创作的一系列抒情小说，都是以多少带有一点变态的性爱为核心内容的，而精神解析、梦境演化正是这类作品的内在结构和主要情绪。

对现代性爱的炽热追求是郭沫若抒情系列小说的内核。在他影响颇大、争议也颇大的抒情小说中，都突出表现了一种对不幸的、无望的性爱的追求，在这里，或是以恋物癖的性倒错来表达这

种追求，如《叶罗提之墓》，或是以色情狂的痴态来渲染这种追求，如《喀尔美萝姑娘》，或是以宗教徒般的虔诚来颂扬这种追求，如《落叶》。总之，郭沫若在这些作品中让人们强烈地感受到了主人公对现代性爱的大胆探求，对性解放这一时代课题的尽情发挥。此外，读者还可以清晰地看到作者自身的情感体验和生活体验在作品主人公身上的真切投影，作者与主人公的情绪重叠本来就是郭沫若整个小说创作的一个共同特征。在作品主人公对现代性爱的追求和探索之中，我们同时领悟到作者对同一问题的高度敏感和睿智。性爱对郭沫若的小说来说，已经不仅仅是一种客观描写的对象，而是一种深沉浓烈的主观投入，是一种精神的渴求和理想的企盼。因此，这些作品对性爱问题的描写就显现出一种格外浑厚的、双重的叠影的内蕴和风采。

与这种现代性爱的时代蕴含相适应，郭沫若是以崭新的理论框架和创作手法来构织其性爱小说的。其中最早价值的尝试，是他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植种在自己的小说创作之中，而《残春》又是其中最典型意义的代表。《残春》完全是以梦幻和精神分析作为“全篇的中心点”和“结穴处”，整个作品并没有铺衍多么新奇的性爱故事，而是注重性爱过程中的“潜意识的一种流动”（郭沫若《批评与梦》）。人物内心与现实的矛盾，情感与理智道德的冲突，原始的人性、世俗的肉欲和纯真的情致都在无形的梦境中得到展现、消融和升华。这篇作品本身的内容也许是像当时有人指责的那样“没有什么深意”，但关键是作品的那场性爱之梦却做得相当完满。可以说现代文学史上这样充分地成功地运用精神分析手法的小说，《残春》或许是第一部。尽管《残春》还不能算是一篇完美的精神分析小说，但它首先通篇运用精神分析引论和手法，从一个独特的角度打破了中国传统小说的基本格局和中国读者传统的阅读心理和批评心理。即使不算《骷髅》，郭沫若也是最早、最成功地把精神分析理论运用于性爱题材作品的现代作家。对新思潮、新理

论、新方法和新情感的充分吸收融合，使郭沫若的性爱小说显示了一种崭新的现代文化的意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残春》及其所代表的郭沫若的性爱小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独特的不可忽视的价值和地位。

三

郭沫若在本质上毕竟是一个杰出的浪漫主义抒情诗人，这种诗人的特质必然映现在其创作的各个方面，小说也不例外。早在20年代，文艺批评家阿英就明确指出，郭沫若的小说“具有浓厚的诗的气息”，读他的小说“使人感到这是诗！”（《诗人郭沫若》）而郭沫若的那些以性爱为题材的抒情小说，诗的气息就愈加浓厚，诗的特色愈加鲜明突出。

首先，郭沫若抒情小说的创作，犹如其诗歌创作一样，具有一种不可抑制的主观冲动，是一种无以自控的情感勃发。特别是以性爱为特定的描写对象，不仅引发了作者青春跳动的思绪，而且牵动着作者深藏于潜意识中的种种欲念和联想，也不仅使作者在对客观对象描写过程中不断投入自身的主观感受，而且甚至直接把描写对象指向作者本身。因此，作者无暇顾及小说情节结构方面的谨严与缜密，而是急于找到一种即刻倾吐内心情思的抒情方式，于是，书信体、自传体很自然地成为郭沫若抒情小说的重要形式。在这些形式里，作者抒情主体的地位确定了，作品的至情描写与客观叙述统一了，作者内心抒发与以此相联系的一切情愫揉为一体了，实质上，一种诗体小说的框架构成了。

其次，郭沫若的抒情小说具有诗一样的浓缩和跳跃性。郭沫若很少敷衍故事情节，有时把本可以铺展开来的动人的故事情节浓缩在一封信、人物的一段对话、一段内心独白，或者是人物的一场梦境之中，人物关系、场面背影都是高度集中、极为简洁的，但作者

的思路飞扬开阔，十分灵活，留给读者填补的空间很大，读郭沫若的小说，往往读的不是故事，甚至也不是人物性格，而是一种启迪，一种联想，一种情感的升腾！

再者，诗的语言也加深了郭沫若抒情小说美的内韵。与郭沫若的诗歌相比，其小说语言似乎更具有诗的韵味，那种充满柔情与灵气的语言，不仅透出一种神采，渲染了一种气氛，同时也带来了一种亲切随和，一种还原了生活的质朴，一种概括了生活的穿透力。

总之，与郭沫若的诗歌善引用故事传说来抒情达意相反，他的小说倒是诗化了的，弥漫着情感、飞腾着情绪的。

目 录

丛书总序:美丽与邪恶的较量	刘 勇 彭斌柏(1)
选编者序	(1)

牧羊哀话	(1)
残春	(10)
歧路	(22)
炼狱	(33)
十字架	(43)
喀尔美萝姑娘	(56)
落叶	(83)
叶罗提之墓	(157)
Löbenicht 的塔	(162)

牧羊哀话

金刚山万二千峰的山灵，早把我的魂魄，从海天万里之外，接引到朝鲜来了。我到了朝鲜之后，住在这金刚山下，日本海上，一个小小的村落里面。村名叫着仙苍里，村上只有十来户人家，都是面海背山，半新不旧的茅屋。家家前面，有的是蒺藜墙围；更有花木桑松，时从墙头露见。村南村北，沿海一带，都是松林，只这村之近旁，有数亩良田，几行桑柘。菜花麦莠，把那农田数亩，早铺成金碧迷离。那东南边松树林中，有道小川，名叫赤壁江，汇集万二千峰的溪流，暮暮朝朝，带着哀怨的声音，被那狂暴的日本海潮吞吸南去。

我初到村里的时候，村里人疑我是假冒的中国人，家家都不肯留我寄宿，幸亏这村南尽头，有位姓尹的妈妈，年纪已在五十以上。一人孤居，长斋礼佛。他听明了我的来意，怜我万里远来，无亲无眷，才把我留在他家中住下了。尹妈门首，贴付白色门联，——朝鲜风俗尚白，门上春联，也用白纸，俨然如同国内丧事人家一般。联上

写的现成诗语。进得门去，小小一个中庭，薄有几多花木。正面家屋，是一列三间，中间堂屋，两边住房，堂屋里有层隔壁，隔成前后两间，有户相通，前堂上首，有座神桌，当中供奉玉磁观音，左手有尊牌位。从户口望去，屋后似有菜圃一方，直接金刚山麓。尹妈叫我在这右手房中住下了。房里别无他物，只有一张短檠，两面推窗，像是久无人居，早变就灰尘世界。

住在尹妈家里，不知不觉的一个多星期的时间瞬已过我而去。我每日里，无论天晴落雨，从早起来，便去游山探胜，抵暮始归。一个多星期之中，除了村后的九仙峰外，这偌大个金刚，快要几乎被我踏遍了。毗卢，弥勒，白马，永郎，凡这万二千峰的朝容晚态，雨趣晴姿，已深深印入我脑海之中；我只一闭眼，一凝眸，便一一如同活动电影一般，呈来网膜之上。只可惜我不是文人，又不会画画；不能把他完完全全的写了出来，画了出来。送给我兄弟朋友们看看呢。

二

独坐九仙峰顶，仙人井畔，西望那夕阳光里的金刚，色相庄严，云烟浮动，我的灵魂，早已陶然沉醉，脱壳优游，忽然阵阵清风，从前山脚下，吹来一片歌声。哀婉凄凉，分明是女儿声息。侧耳听时，只听道：

太阳迎我上山来，
太阳送我下山去，
太阳下山有上时，
牧羊郎去无时归。
羊儿啼，
声甚悲。
羊儿望郎，郎可知？